

讲座回顾 | 沈艾娣教授：小斯当东是怎样成为译者的？

翻译研究中心

2021年10月29日晚8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翻译研究中心为庆祝成立五十周年而举办的“翻译史讲座”第十讲在腾讯会议开讲。第十讲的主题为“小斯当东是怎样成为译者的？”，由牛津大学东方系何鸿燊中国历史讲座教授，牛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研究员沈艾娣教授主讲，并由香港中文大学翻译研究中心主任王宏志教授主持。讲座吸引了海内外数百位听众参加，既有翻译史、思想史领域的专家，也有来自各大高校的青年教师和学生。现将此次讲座内容辑录如下，以飨读者。讲座原文为英文。



△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 教授

讲座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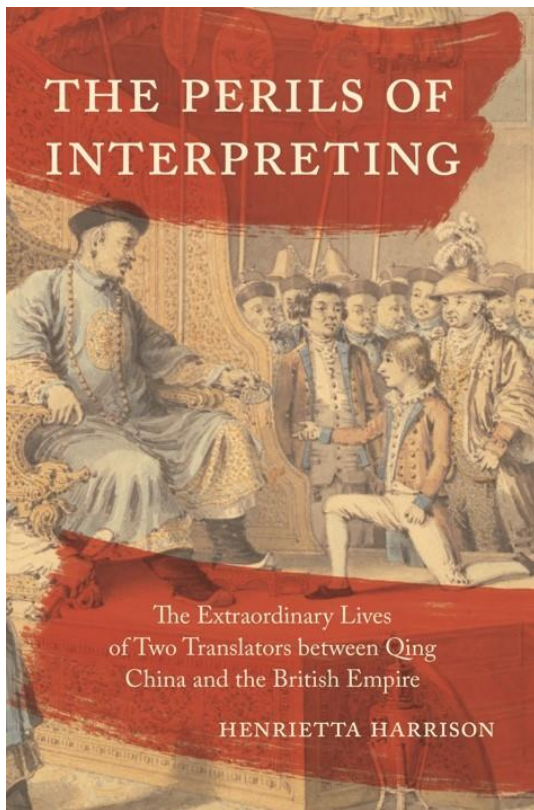
一. 引言

二. 入题：小斯当东学习语言和翻译的路径

- 三. 小斯当东早年的中文学习
- 四. 小斯当东是怎样成为译者的?
- 五. 密友与译者: 小斯当东与马礼逊
- 六. 尾声与总结

一. 引言

沈艾娣教授以新书的封面故事作为讲座的引入。沈教授此前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书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讲述了 1793 年来华的马戛尔尼使团 (Macartney Embassy) 中两位译员精彩的人生经历。



图书信息

The Perils of Interpreting: The Extraordinary Lives of Two Translators between Qing China and the British Empire

- 作者: 沈艾娣 (Henrietta Harrison)

- 出版社：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出版时间：2021-11
- 页数：312
- 定价：\$29.95 / £25.00
- ISBN：9780691225456

画中单膝下跪的男孩正是小斯当东（George Thomas Staunton, 1781-1859），而他身后穿着相同服饰的男子则是书中的另一位主人公、使团的中国译员李自标（Jacobus Ly, 1760-1828）。

沈教授简要介绍了李自标和小斯当东的生平。李自标来自甘肃，在意大利受训成为一名天主教神父，担任了使团大部分的翻译工作。而小斯当东在出使时年仅 12 岁，凭借其父大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 1737-1801）在官方记录中对他的详细记录而为人熟知，这段访华经历也开启了他作为译者的非凡人生。小斯当东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职员、银行家和国会议员。

沈教授表明，讲座将从翻译史的角度出发，讲述分析小斯当东作为译者的非凡人生，并涉及一些新书中没有论述的案例。

二. 入题：小斯当东学习语言和翻译的路径

沈教授以小斯当东学习中文的过程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她指出，她关注的不仅是小斯当东的语言学习的具体过程，还有他学习翻译的过程以及他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翻译风格。沈教授的主要观点如下：

一，当时英方希望能有英国译员，因为尽管行商能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pidgin English，下文称“广州英语”），但是英方认为行商面对清朝官员会用卑屈低下的措辞翻译英方原文，有损英方颜面。

沈教授发现，其实小斯当东的翻译策略、风格和中国译员大体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他是地地道的十八世纪式英语呈现译文。沈教授指出，小斯当东优美温和的翻译风格使清朝官员的辞令更易被英国人接受，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谈判双方的矛盾，促进双方达成一致。

二，沈教授以小斯当东的好朋友、同为译者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作为对照，比较两人的翻译策略。作为首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目的是译介《圣经》，因此他的翻译策略是寻找同义词、逐字逐词对译。马礼逊的翻译十分忠实，并不适合政治与外交谈判场合。两人翻译风格、策略的形成与他们的社会阶层、学习语言的路径有着莫大关系。马礼逊的翻译存在一定问题，但他的翻译方式对培养下一代的英国译员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最后，沈教授认为，在翻译史研究中，不仅要关注译者的国籍和翻译技能，译者接触外语的路径和他们翻译的策略、风格都值得研究者继续深入探讨。

三. 小斯当东早年的中文学习

沈教授从小斯当东学习中文的过程开始讲述。她认为，小斯当东学习中文的方式深深影响了他此后对语言和翻译的理解。

四岁前，小斯当东在盖尔语和英语的双语环境中度过，五岁开始学习拉丁语。小斯当东的父亲大斯当东是一名卢梭教育哲学与沉浸式教学法的信徒，为小斯当东学习外语提供了良好的语言环境。当时学校通常用语法书教授拉丁语，而小斯当东则在与父亲的日常对话中学习拉丁语。

十一岁时，小斯当东开始每天学习中文，他的老师是马戛尔尼使团的中国译员柯宗孝（Paolo Cho, 1758-1825）。柯宗孝生于北京的一个军官家庭，少年时代在北京接受教育，其后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受训成为神父，能说一口标准的官话和拉丁语。他是一位严厉的老师，尽管在出使的航程中有诸多限制，教学材料不多，但他仍想尽办法凭借中文-拉丁语词典和能找到的各类中文文本教授小斯当东。从英国到中国的航程耗时颇长，当十二岁的小斯当东踏上中国的土地时，他已经接受了8到9个月的中文课程。

到达中国后，柯宗孝离开了使团，另一位中国翻译李自标又无暇教授小斯当东，于是大斯当东在北京雇了一个童仆陪着小斯当东练习中文。当使团在澳门停留等待回英时，大斯当东又通过当地天主教徒的关系，花三百银元高价买了一个会讲官话的男孩 A Hiue 跟他们回英。可见，大斯当东颇费心思为小斯当东营造学习中文的语言环境。

接下来，沈教授向观众展示了另一幅关于小斯当东的图画，这幅画出自英国著名肖像画家 John Hoppner 之手。



△ 小斯当东与母亲 Jane Staunton

画中描述了小斯当东结束出使后与母亲见面的场景，母亲手中拿着他的信，身后的中国男孩端着一个有中文字字的盒子。沈教授认为这个男孩很可能是在澳门买的那个男孩。但是，这个出身贫寒的中国男孩是个文盲，显然无法教授小斯当东读写中文，小斯当东只能继续从书中自学。

年轻的小斯当东十分勤奋好学，博览群书，从一封他给父亲的家信中可见一斑。他写道，度假的时候他正在阅读希腊历史和游记作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前484-425）的著作，同时还在学习中文、数学、拉丁文，阅读罗马历史，研究科学，尤其喜欢数学。当他的堂兄想要学习化学时，他还借给堂兄一本当时很流行的法国化学家拉瓦锡（Lavoisier，1743-1794）的著作。对于自己的翻译得到中国皇帝的认可一事，年轻的小斯当东谦虚地回应，自己的翻译还有待改进，

尤其是谚语的翻译。沈教授认为，诚然在中国人的眼中小斯当东的翻译还是有不少纰漏，但对一个年仅十二岁初学中文的男孩来说，已经是相当不错的成果。

时间来到 1800 年，在结束出使后七年，小斯当东前往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广州商馆（Canton Factory）工作，再次回到了中国。但他进入东印度公司的过程却是一波三折。



△广州商馆

驻广州东印度公司的职缺对当时的英国人来说极具吸引力，因为持份者可从东印度公司的交易利润中获得稳定的分红，只要坐稳位置就能财源滚滚。归根结底，进入东印度公司并不凭经商技巧或专业知识，而要仰赖和公司董事的关系。

在 1796 年，也就是使团回英后两年，大斯当东开始谋划让通晓中文的小斯当东进入公司。但他的请求被当时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巴林银行家族的法兰西斯·巴林（Francis Baring, 1740-1810）一口回绝。大斯当东没有放弃，在编写出使记录时，他特意将小斯当东画在使团觐见图的正中央，又带着儿子和记录出使的书籍游说贵族，让他们向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们施压。1799 年，在强烈的反对声中，年轻的小斯当东带着中国随从忐忑地踏上了前往广州的旅途。



△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与大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

小斯当东的紧张并非没有来由。他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学校教育，对和同事的社交有些忐忑，而且他对自己的中文翻译水平并不太自信。他觉得即使自己的中文说得和他的中国随从一样流畅，也并不代表自己能很好地和清朝官员们沟通。为了提高翻译水平，勤奋的小斯当东在旅途中阅读《三国演义》，练习中文书写和翻译。

而在另一边的广州，法兰西斯·巴林的儿子亨利·巴林（Henry Baring, 1777-1848）却对即将到来的小斯当东不屑一顾。可见，小斯当东的到来并不受东印度公司的欢迎，他在广州被孤立的处境令他十分思念家乡。

四. 小斯当东是怎样成为译者的？

在接下来的部分，沈教授讲述了来到广州后的小斯当东在中国行商的引领下逐步成为一名译者的故事。

小斯当东与行商的缘分始于他刚到广州时广州商馆举行的一次正式会见，会上英国人与十三行行商使用“广州英语”流利地交谈。行商的英语口语给小斯当东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形容那是“流利但难懂的行话（with great fluency though in a corrupt jargon）”。初来乍到的小斯当东在会见中有些不知所措，直到有一名行商用官话向他攀谈。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小斯当东不仅听懂了，还能顺利交谈，这证明了他之前学习中文的努力没有白费。

在讲述了小斯当东与行商的初识后，沈教授选取了三个精彩的具体案例展开说明小斯当东成为译者的过程。小斯当东作为译者遇到的第一个挑战是在 1800 年英国水手开火误伤华人一案的谈判中担任翻译。其后，小斯当东为了提高自己的中文和翻译水平，在澳门觅得一名中文教师 Michael Ko 继续学习。第三个案例则牵涉到一场复杂的商业纠纷，行商潘长耀（崑水官，Consequa, 1759-1823）所担保的英国水手走私羊毛被发现，导致潘长耀面临巨额罚款。和 1800 年一样，小斯当东再次担任了谈判的翻译。

沈教授从案例一和三中所牵涉到的两位极有权势的富商潘有度（潘启官，Puankhequa II, 1755-1820）和刘德章（章官，Chunqua I, ? -1825）开始介绍。潘与刘两人是商业竞争对手，潘家刘家都在朝中有人，潘作为当时最富有的行商之一，颇为忌惮刘的势力范围快速扩大。

而刘德章正是在行商会见中第一个用官话向小斯当东交谈的人。刘德章出生于安徽桐城，到了刘德章这一代，刘家开始有足够的财力资助家族成员参加科举，可以说刘德章是刘家发迹的关键人物。他的儿子刘承澍则是户部的乌布，当时身陷一桩贪污丑闻，近年有一些关于他的档案研究，如毛亦可〈清代六部司官的“乌布”〉（20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嘉庆十四年书吏冒领库项案档案”〉（2018）。

但和广州行商相比，徽商刘德章在贸易中有一个极大的劣势，就是他不会说“广州英语”，只能让弟弟替他翻译，沟通上的困难让他并不受外商欢迎。当刘德章

发现小斯当东会讲官话时，他意识到小斯当东将大有用处，于是他留心结识小斯当东为己所用。

紧接着，沈教授介绍了另一位行商潘有度（字致祥，商名潘启官）。近年来，潘有度比刘德章更为人所熟知，潘剑芬在《广州十三行行商潘振承家族研究（1714-1911）》中对潘家进行了深入研究。潘有度的父亲名叫潘振承（1714-1788），福建泉州人，曾经在菲律宾和西班牙辗转游历，其后举家迁到广州，建立了他的商业帝国。在掌握西班牙语的基础上，潘振承很快学会了英语，开始和刚在广州落脚的英国人做生意。潘振承的儿子接受了良好的教育，潘有度的哥哥潘有为（1743-1821）是进士，曾经参与编纂《四库全书》。而潘有度则被培养为家族生意的接班人，据记载他从小就能讲一口流利的“广州英语”。

在小斯当东来到广州时，潘有度已经是行商之首。因为重要场合的翻译会涉及权力与外交的关键问题，所以通常都由潘有度翻译，而非日常负责翻译的“通事”。沈教授指出，通晓中文的小斯当东的出现对潘有度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因为潘有度觉得自己作为谈判翻译的有利位置可能不保，而通过小斯当东，商业对手刘德章也会进一步接触到英国人。

在介绍完两位行商后，沈教授开始讲述 1800 年的事件。当时，一名乘着小船在英国海军船附近巡逻的英国水手因船锚曾失窃，误以为附近有人在偷海军船锚，于是在黑暗中开火，致使一个中国船夫重伤。但是，自从 1784 年一个英国水手因争议性的误杀案被中方处决后，东印度公司就拒绝向中方移交任何被控罪的水手。争议在所难免，一场外交危机正在发酵。

一般来说，富有经验的潘有度是担任谈判翻译的不二人选。于是，潘有度试图向英方解释清楚中国官员的要求，说服英方交出犯事的水手。但与往常不同的是，东印度公司指名让小斯当东代替潘有度担任翻译，借机测试小斯当东的翻译水平。站在东印度公司的立场，如果小斯当东不能顺利完成翻译，正好可以趁机解雇他；如果他可以完成任务，则平添一个翻译人才，未尝不是好事一桩。

年轻的小斯当东面对即将到来的翻译工作，尤其是翻译中国的法律条文，感到十分紧张和忐忑，但最终他完成了任务。在几次谈判之后，中方已经习惯了小斯当东的翻译，甚至提出不需行商参加最终谈判。中方官员对小斯当东说，如

果他再练习三年，就能达到母语者的水平，这样的肯定评价大大激励了小斯当东。于是，东印度公司的大班 Richard Hall 决定继续考验小斯当东的笔译能力，他让小斯当东当场笔译吉庆给他的《大清律例》段落，小斯当东再次轻松地完成了测试。

Hall 又让小斯当东翻译一份吉庆的声明，而这份声明此前已经经过潘有度的初步口译。由于潘有度不懂笔译，所以英方还需要将他的口译进行笔录。这场测试透露了一个有趣的事实：其实在小斯当东翻译之前，英方已经有了一份行商的翻译。经过小斯当东翻译后，东印度公司的委员会觉得吉庆的言辞十分令人不悦。小斯当东在几天后写给父亲的信件中描述了这次中译英的为难之处，他认为这是因为吉庆的语调处处透露着中国官员一贯秉承的“天朝上国”的傲慢态度造成的。

更让小斯当东不解的是，在一系列的谈判后，潘有度指出小斯当东的翻译有误。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翻译，小斯当东准备在会见上承认错误并道歉，但在会上潘有度却又说小斯当东并不是译错了某个具体词汇的意思，而是比较模糊的问题。最后，Hall 判定小斯当东的翻译大体可以接受，这让小斯当东松了一口气。

沈教授认为，这时的小斯当东翻译技巧还有所欠缺，而会后潘有度和商馆的华人买办、职员应当与小斯当东讨论了他翻译中存在的问题。他们向小斯当东解释吉庆的风格一向如此，提醒小斯当东在翻译中要适当调整，让吉庆的言辞听起来符合他的崇高声望。这是小斯当东在成为译者的路上学到的重要一课，也影响了他以后的翻译策略。

在英译中的时候，经验不足的小斯当东又面临着另一个难题：等待他翻译的是船长 Dilkes 长达 40 页的怒斥。潘有度显然不想让中方听到船长的辱骂，所以他拒绝像以往一样将原文口译成中文。临危受命的小斯当东表示他需要大约两周的时间与查阅书籍后才能翻译。在开始翻译以后，小斯当东发现困难超乎预料，于是他提出需要中国助手。Hall 向他推荐了一个年轻买办，这也让他得以进一步接触商馆的下层年轻职员。最终，小斯当东交出了一份让吉庆读起来能接受的译文。值得注意的是，小斯当东已经懂得书写清朝皇帝的称谓需要高于其他行首，其次才是英国国王和吉庆，这让吉庆十分满意。沈教授指出，经过此事

的历练，小斯当东学会了运用翻译在谈判中调和双方矛盾的技巧，而吉庆对他的肯定也说明小斯当东的翻译是合适的。

因为小斯当东不受英国同事的欢迎，在社交上颇为受挫，他逐渐和商馆里的中国行商以及职员走得更近，这对提高他的中文水平有所帮助。不过，小斯当东随后发现，这一次谈判成功的背后离不开刘德章的精心谋划。英国人认为，刘德章打点了吉庆的手下，劝说他们在谈判中妥协，还给了被误杀的船夫家庭一笔补偿，让他们息事宁人。小斯当东还留意到，潘有度对他的态度并不太友好，不过处事圆滑的潘有度并没有在表面上展现敌意。

在 1800 年的谈判中初试身手后，小斯当东觉得自己需要进一步提高中文水平。在非贸易季节，赋闲的小斯当东开始在澳门寻找中文老师。沈教授介绍，因为种种限制，小斯当东很难在广州找到除了通事以外的中文老师，而通常通事又忙于官方的翻译工作，无暇教授。不过，在澳门就容易得多了。通过一个法国传教士的关系，小斯当东找到了一名叫 Michael Ko 的中国人，尽管 Ko 并不是学者，但水平也足以教授小斯当东。在澳门，小斯当东每天花费约两小时阅读和翻译《京报》，因为《京报》上刊登了大量的政府公告，有助于他翻译官方文书，同时《京报》作为广泛流通的邸报也很容易获取。整个四月和五月，勤奋的小斯当东都在认真地练习翻译，还开始学习翻译清廷的档案，为以后的翻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京報》存照

接下来，沈教授讲述了小斯当东成为译者过程中的第三个事件，这个事件由行商潘长耀而起。首先，沈教授介绍了潘长耀和小斯当东的关系。潘长耀是潘有度的子侄辈，而小斯当东则常借钱给潘长耀或通过潘长耀放贷。大斯当东于1801年去世，小斯当东在继承大笔遗产后，开始和母亲合作经商，利用中英汇差炒卖白银和放贷，获得了第一桶金。东印度公司的英国商人一般会参与印度贸易，但小斯当东不受公司里英国人的欢迎，无法从印度贸易中分一杯羹，于是他转向投资。沈教授认为，小斯当东的资金很有可能是通过潘长耀出借的，而潘长耀也给了小斯当东丰厚的回报，两人的关系十分密切，小斯当东在多年以后仍然记得潘长耀家中的景象，而潘长耀热衷于与英国人交友，有时也会担任翻译。

在介绍了两人的关系后，沈教授讲述了潘长耀卷入的商业纠纷。潘长耀担保的一艘英国船只上的英国水手走私羊毛布料，虽然羊毛并不贵重，但粤海关部打算杀一儆百，对潘长耀处以巨额罚款。为了缴纳罚款，潘长耀只能想办法尽快

收回贷出的款项，而欠债的印度商人 Gregory Baboon 却无力偿还，连锁债务演变成了错综复杂的商业纠纷。

小斯当东再次在多方谈判中担任翻译。潘长耀希望东印度公司代他向当时的两广总督吉庆求情，小斯当东将他的请求译成英文递交给了东印度公司。同时，在英商方和省府等的沟通中，小斯当东又负责将英方的信件翻译成中文。值得注意的是，表面上小斯当东是英方信件的译者，但其实行商也有协助，最后再由小斯当东誊写成中文，这样信件译者名义上就仅是小斯当东一人。据小斯当东的记载，翻译英方信件时刘德章也提供了帮助。鉴于刘德章和清朝官员的密切关系，英方怀疑刘德章在背后设局构陷潘长耀，削弱潘家势力，所以要求刘德章也介入此事协助小斯当东。在刘德章的指导下，小斯当东的译文已经基本能符合中国官方文书的规范标准。

除了信件的翻译，沈教授还介绍了商业谈判中的翻译过程。潘长耀向英方陈述了他遭受的折磨和不公正对待，但他讲的内容太多、语速太快，让英国人难以理解。于是，英方让他写下内容，由小斯当东翻译成英文，再由东印度公司的 Hall 朗读一遍确认译文，让潘长耀起誓所言属实。出于和潘长耀的合作关系，又有刘德章的协助，尽管过程一来一回需要耗费好几个小时笔译，小斯当东仍然很乐意担任潘长耀的谈判翻译。沈教授表示，在潘长耀的案例中，不难发现小斯当东的翻译有很强的目的性，显然他的翻译不是为了准确传达双方意思，而是为了借助翻译的机会尽可能为潘长耀陈情，在谈判中争取最大的利益。

沈教授继续以小斯当东 1805 年对英方船长 Wood 信件的中译为例，分析小斯当东的翻译策略和风格。沈教授重申，不应因小斯当东英国人的身份，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小斯当东的翻译会和行商的风格大相径庭，相反，小斯当东正是在和行商的来往和谈判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翻译策略。

1805 年的信件大致讲述了英国船长 Wood 在装货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货箱里装着的是贵重的燕窝，将货箱随意摆放在沙滩上，导致燕窝被当地人偷走。于是船长向中国当局写信，要求调查此案，追回货物。现存档案应当是信件的草稿。

沈教授分析了信件的细节。首先，小斯当东将“天朝”和“大皇帝”的称谓写在该行行首，并且稍高于其他行的首字。而在誊写“两广大人”和“王（我国王）”的

时候，小斯当东会另起一行，同样将“两广大人”和“王”置于行首，位置则稍低于“天朝”和“大皇帝”。显然小斯当东深谙中文文书的标准写法。他还将船长 Wood 的自称译作“远官”，以体现民众请求总督大人主持公道的恭敬姿态。

在分析小斯当东的中译后，沈教授也举例分析了他的英译。1805 年，小斯当东替继任的两广总督倭什布（? -1810）翻译了一封奏折。奏折上倭什布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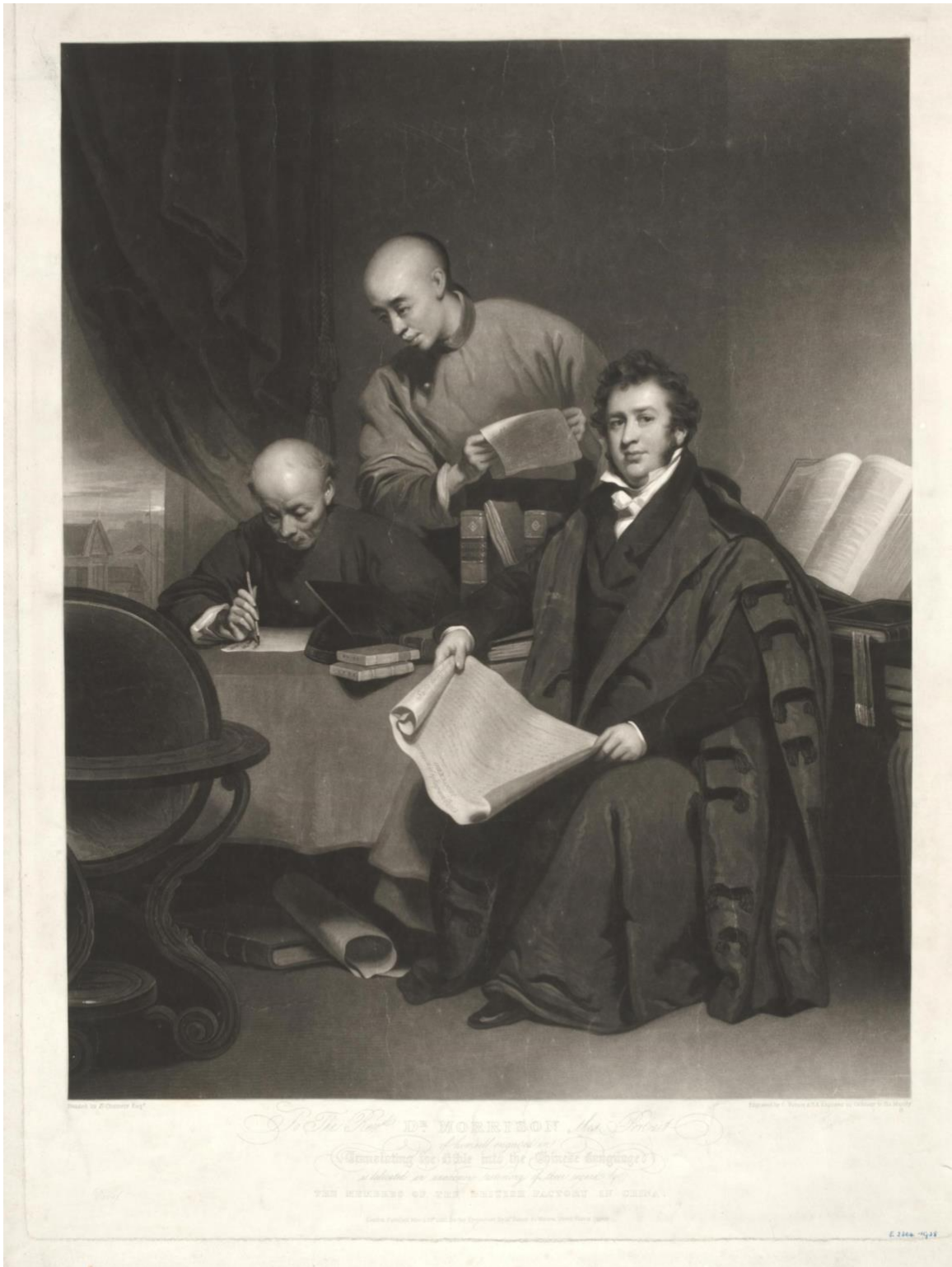
英吉利國夷目多林文
因該國向來恃強住澳夷人是以驚疑等情

小斯当东在翻译中作了大刀阔斧的改动。首先，他补全了“多林文（Drummond）”的名字“James”，以表尊敬；贬义的“夷目”则译作“the chief of the English nation”。而“恃强”这一贬义词，在小斯当东笔下巧妙地译作“that nation being distinguished by its strength and power”。这样一来，倭什布的负面评价在东印度公司看来却是一封毕恭毕敬、歌功颂德的文书（“respectful and flattering to the national character”）。

通过对以上两篇译文的分析，沈教授总结道，小斯当东翻译的目的是为了让双方得到一个可以接受的谈判结果，而作为一个译者，他在其中起到了迂回调停的重要作用。而像潘有度这些行商们在日常交涉中的口译活动，或多或少也起到了类似的调和双方矛盾的作用。

五. 密友与译者：小斯当东与马礼逊

在讲述了小斯当东成为译者的历程后，沈艾娣教授以小斯当东的密友——马礼逊的翻译作为对比，进一步分析了小斯当东翻译的目的、特点和策略。



△马礼逊和中国助手

马礼逊于 1807 年到达中国，他和小斯当东是当时仅有的两个能读写翻译中文的英国人。不过，两人的出身相去甚远，小斯当东出身爱尔兰的中上层阶级，而马礼逊则是雇农的儿子，后来帮着家里在鞋楦作坊里工作。马礼逊十分勤奋好学，在家族虔信基督教的影响下，他努力进入了神学院。在神学院他萌生了要去中国传教的想法。在伦敦，马礼逊与一个正在学习英文、准备投身贸易的中国青年同住，初步接触了中文。马礼逊与小斯当东同岁，但在马礼逊来到中国时，小斯当东已经发迹，马礼逊却因为在航行中花掉了大部分的积蓄而一贫如洗，身上只带着一封介绍信。小斯当东慷慨地资助了马礼逊，并为他寻找学中文的途径。

沈教授认为，两人学习中文路径的不同，导致了两人在语言的理解和运用上也有所不同。小斯当东从小就接触到不同的语言，习惯从口语对话开始学习。而马礼逊直到成年才有机会学习中文，在此之前他只从学校学过教会拉丁语，缺乏外语交谈的经验。

除此之外，两人学习中文和翻译的目的也不同。小斯当东因出使任务接触中文，而马礼逊学习中文的目的是传教，翻译《圣经》。在马礼逊心目中，《圣经》是无比神圣的，和讲究灵活变通的谈判翻译不同，《圣经》的遣词造句不能轻易改动。基于这一点，马礼逊偏好在翻译时尽量寻找中英文之间的同义词，尽量不改动原文含义，同时他还希望能编写一本能清楚阐释词汇释义发展源流的中英词典。

起步较晚的马礼逊花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提高自己的中文水平，而小斯当东在马礼逊来到的时候，中文已经相当熟练。同时，马礼逊又花时间学习广东话，小斯当东则从未学过广东话。

在介绍两人的经历后，沈教授以来华三年的马礼逊在 1810 年翻译的两广总督百龄（1748-1816）的文书为例，分析马礼逊翻译的特点。百龄的原文如下：

至所近之稟文義不通體裁亦未盡合姑念外夷不諳中華文義不為深究稟三叩發還

百龄认为呈上的译文并不令人满意，但鉴于外国人不了解中文的书写体裁规范，他不会在意翻译的疏漏，现将文书发还。百龄的措辞委婉克制，而马礼逊的英译如下：

Respecting the address that was presented; the manner of the composition was not perspicacious, the body and cut of it also was not perfectly suitable. I compassionately consider that the foreigners do not understand the middle charming empire's manner of composing; I therefore do not make a deep enquiry into the address (by demanding) (1) three prostrations but return it.

(1) I make a full enquiry is expressed by doing it three times and when a person is called before a magistrate kneeling and touching the ground with the forehead follows of course or, as we have not an English word to express that exactly – Prostration, hence the expression Three Prostrations.

(IOR/G/12/170 Consultations 1810)

不难发现，马礼逊的翻译几乎是逐字直译而来的，读起来古怪拗口，比如将“体裁”译成“the body and the cut”、“中华”逐字译为“the middle charming empire”，尤其是翻译“三叩”的时候，马礼逊甚至还加了大段脚注说明“三叩”的含义。显然他误解了百龄的措辞，以为百龄要求英方向他行礼。经过马礼逊的翻译之后，百龄原本委婉的言辞变成了难以理解的强硬要求。沈教授认为，尽管当时英国人对百龄不抱好感不能归咎于马礼逊的误译，但在这段话中百龄的确没有展现敌意。马礼逊尽量不改动原文和务求同义词的翻译策略，很大程度上导致了他的误译。

沈教授以小斯当东对同义词的看法与马礼逊进行比较。据小斯当东所书，他并不认为两种语言之间存在着精确对应的同义词，两个文明相距越远，语言的相似度就越低。小斯当东不执意于同义词直译的翻译策略，使他在翻译时有更大的自由度和遣词造句的空间。

下文是小斯当东在 1810 年对一封南海县官文书的英译（中文原文缺失）：

... We are solicited to inform the Emperor Himself and at the same time to make a communication to the King of that Country to the end that he may seek out the same murderer and deliver him up for trial in this country. Now on a consideration thereof we find that because the Witness Fang Ako was unable to state the name of the culprit the Security Merchant and the Chief Roberts had not evidence whereupon to find and surrender him up to us...In the meantime the name of the responsible

merchant must be duly stated to us and the rest our orders obeyed with the greatest promptitud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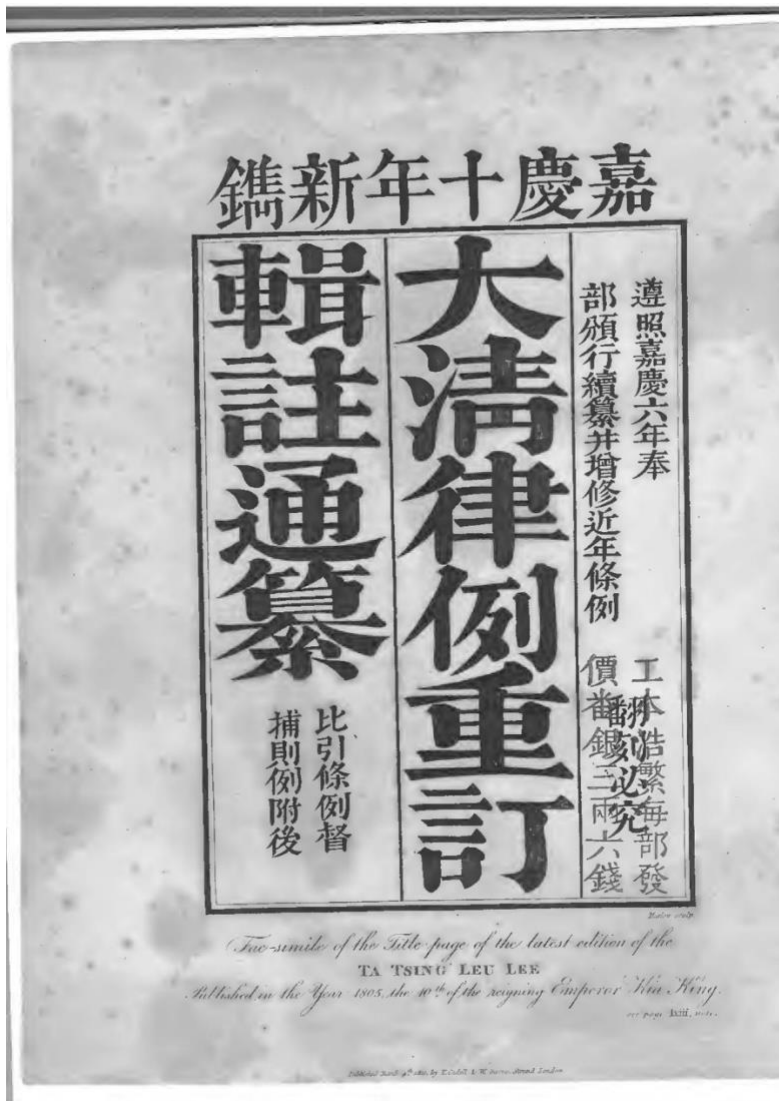
沈教授分析，小斯当东完全是在按照英国官僚的语言风格翻译，这样的翻译使南海县官的话在英国人听来像一名地方治安法官的发言。

沈教授察觉到了小斯当东在 1800 年和 1810 年间翻译风格受到了和马礼逊工作的影响而产生的细微变化。她推测，1800 年的小斯当东会更倾向于将中文原文中的“国王”按英国的习惯稍作改动，译为“His Majesty, King George, the third”，而非“The King of that country”。同样，1800 年小斯当东在翻译人名“多林文”时按照英国的称呼习惯补全了 Drummond 的名字 James，但在 1810 年的译文中，他按照中文原文的称呼习惯仅保留了英国长官的姓 Roberts。1810 年的译文在英国人听来可能会稍欠礼貌，但更接近原文行文。沈教授推测，小斯当东和马礼逊的交流讨论可能对小斯当东的翻译观念产生了一定影响，使他曾尝试向更忠实于原文的翻译风格靠近。不过，在大部分场合中，他仍然会像 1810 年的译文一样，遵循英国官员的语言风格翻译，注重译文整体的自然流畅。

小斯当东曾经反思中译英过程中的难点，他认为在中译英的过程中，很难找到对应的词汇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思，而隐喻的翻译则更为困难。这样的理念贯彻在小斯当东的翻译中，也导致了他和马礼逊大相径庭的翻译风格。不过，致力于编写词典和教授翻译的马礼逊，则对下一代的英国译者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小斯当东的出身决定了他不会屈就当一名中文老师，而小斯当东利用语言环境和日常对话学习中文的方式，也难以被复制。马礼逊勤学苦记的学习方式则更易于被有志成为译者的年轻人模仿、推广。

沈教授在分析两人翻译的不同之处时，也讲述了两位伟大译者之间的深厚情谊。两人曾经同住并且非常了解对方的翻译事业。在多年以后，晚年的马礼逊回乡后，小斯当东赠给他一份贵重而又特别的礼物——一个银镀金的墨水台。台上铭文刻着：To the Revd. Robert Morrison D.D from his affectionate friend George Thomas Staunton（赠予尊敬的马礼逊教士，您的挚友小斯当东）。马礼逊深受感动，他感激地回复小斯当东，他非常感谢这二十年来小斯当东热情慷慨的帮助和深厚的友情。

这两位有着深厚情谊的伟大译者在方方面面都影响了以后的译者。马礼逊的翻译方法和学习方式得到推广，而小斯当东则凭借翻译《大清律例》（*Ta Tsing Leu Lee*, 1811）青史留名。近年来许多关于英译《大清律例》的研究都注意到，为了提高《大清律例》在英语读者群中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小斯当东在翻译中作出了大量调适和取舍。沈教授表明，她的关注点并非是法律本身或者小斯当东对中国法律的看法，而在于《大清律例》中所体现的小斯当东的一以贯之的翻译理念和策略。



△《大清律例》书影

沈教授还观察到，在翻译《大清律例》时，小斯当东采取的工作方式也和马礼逊不同。小斯当东的翻译基于他大量的阅读，部分来自于他在社交场合与华人

的交谈和探讨。他不喜欢和他人一同翻译，因为他将翻译视作一种“闲暇时的消磨和个人爱好（an agreeable occupation）”。而马礼逊则和上文那幅代表性的画像里的场景一样，乐于聘请中国助手一同工作。

为了翻译《大清律例》，小斯当东搜集了大量的书籍，其中 554 卷在 1823 年运到了伦敦大学，而这只是他丰富藏书的一部分。这 554 卷中有 30 卷与法律相关，现藏于利兹大学图书馆（Brotherton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Leeds）。除此之外，小斯当东还有 400 卷的词典，包括韵书、《康熙字典》等，可见小斯当东在翻译过程中会常常查阅书籍。

而在查阅资料之余，他也会用大量时间与华人交谈了解相关知识，因为如果要向英语读者译介《大清律例》，小斯当东需要了解清朝的国体以及各类制度，比如清朝的专卖制度、财税制度，这都需要他向相关人士请教。和马礼逊翻译《圣经》不同，小斯当东面对的文本是他不熟悉的中国官方文件。西方译者对《圣经》原文的了解毫无疑问会胜过读者，而中国官员会比小斯当东更了解律例条文。在缺乏前人翻译经验的情况下，小斯当东再次运用了他的社交技巧，利用行商举办的宴会，和行商、买办、官员等各类人交谈，得到了不少帮助。由于他会讲中文，中国行商宴请官员时也会请上他，他还常常出席潘有度的宴席。尽管小斯当东被其他英国商人拒之门外，但是通过中国行商，极具金融头脑的小斯当东获利甚至超过了参与印度贸易和鸦片贸易的英国商人。

六. 尾声与总结

在讲座的结尾，沈教授展示了 19 世纪二三十年代汉普郡郊外小斯当东花园的图画。画中的花园里有一座小圣堂，圣堂里的纪念碑有一块是为了纪念小斯当东的父母，另一块则是为了纪念亲友，其中就包括了潘有度。

小斯当东还有一幅潘有度的画像，他将这幅画挂在家中房间的壁炉上。他不仅与行商以及官员关系密切，而且和商馆里的华人下层职员也很谈得来。沈教授认为，小斯当东这种能促进谈判双方和解的翻译风格，不是靠中国助手的帮助，而是源于他平时大量的阅读与研究，以及他日常社会交际中与华人朋友们的交谈和积累。

最后，沈教授以她的观点作结。

第一，小斯当东的翻译高度服务于谈判双方的和解，这一定程度上和他学习语言的经历有关。对从小在语言环境中学习外语的小斯当东而言，语言是一个统一的系统而非一个个割裂的词汇，翻译时也要注意译文的整体性。在中国的时候，他在商业谈判和外交场合中成长为一个译者，投入了大量时间和行商、商馆职员、朋友讨论如何学习中文和提高翻译水平。《大清律例》的译本可以说是小斯当东从社会环境中学到的翻译技巧的集大成者。

第二，小斯当东和马礼逊两人的出身、翻译目的和学习语言路径的不同，导致了他们的翻译风格迥异。和在社交场合中学习翻译的小斯当东不同，成年才学习中文的马礼逊为了翻译《圣经》和编字典，他致力于寻找中英文的同义词和解析词源。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马礼逊最终达成了目标，走上了培养下一代译者的道路。

第三点，本次讲座主要讲述了 1811 年以前小斯当东成为译者的故事，而他翻译风格在 1814 到 1816 年间一度发生了变化。皇权的更替、英军强占澳门等一系列动荡导致了中英关系的逐步恶化，大大影响了小斯当东在中国的社交活动。他的两个中国好友被逮捕、流放，这令他十分不安和愤怒。在 1814 年的一次谈判翻译中，小斯当东一反往常的翻译风格，使用了愤怒和极具侮辱性的言辞。沈教授认为，小斯当东的一反常态并非是他要颠覆自己的翻译风格，而是因为身边的变故影响了他的翻译。

最后，沈教授指出，小斯当东作为译者的人生经历说明了译者的观念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因应社会环境的变化，译者的观念也会不断改变和发展。每个人在人生中都会不断地改变，我们如此，历史中的人物当然也是如此。（全文完）

**欲进一步了解相关内容，
欢迎关注沈艾娣教授新书**

部分参考文献

Morrison, Robert. *Morrison's translation of an 1810 letter from Bailing* (IOR/G/12/170 Consultations 1810).

Staunton, George. T. *Miscellaneous Notices Relating to China, and Our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at Country, including a Few Translations from the Chinese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Staunton, George. T. *Staunton Letters*, Duke University Library, NC, America.

Staunton, George. T. *Staunton's translation of an 1805 letter from Captain Wood into Chinese* (National Archives FO 1048/5/1).

Staunton, George T. *Ta Tsing Leu Lee; Being the Fundamental Laws, and a Selection from the Supplementary Statutes, of the Penal Code of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毛亦可：〈清代六部司官的“乌布”〉，《清史研究》，2014年第3期，页78-91。

潘剑芬：《广州十三行行商潘振承家族研究（1714-19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嘉庆十四年书吏冒领库项案档案”〉，《历史档案》，2018年第4期，4-28。